

# 一个青年的来访

## ——对 1939 年 5 月周作人的外围观察——

王俊文

论文摘要：周作人 1938 年和 1939 年两年间所作文章多为“抄书”的短篇笔记。1939 年元旦遇刺后，更加深居简出。探究其此间思想动向的材料并不充分。本文将一位拿着武者小路实笃的介绍信、深得柳田国男的信赖和喜爱、在竹内好的向导下于 1939 年 5 月两次拜访周作人的日本青年在 1974 年的访谈为线索，边解读这篇访谈边探讨周作人当时的心境。周作人批判转向者，鄙夷充当政府军队和媒体工具的文学者，而另一方面，对跟自己一样喜欢背对时局、采取旁观态度的永井荷风的异国年轻人却深有好感；对把自己当作超越国家疆界的“新村”兄弟的武者小路亦怀抱感激之情。1939 年 5 月当时周作人的立场从他他对周围日本人的态度应能见出端倪。

关键词：周作人 池上隆祐 久米正雄 转向 佐野学 柳田国男

### 一、前言

1938 年 2 月 9 日周作人参加“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引起轩然大波。1938 年 5 月 5 日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通电全国文化界，第一次把周作人的名字与“汉奸”联系在一起。之后的伪北大图书馆馆长和文学院院长的职位，基本只是“领着干薪”。直至 1941 年 1 月就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

署督办”，“附逆”终成不争的事实。1938年和1939年两年间周作人所作文章多为“抄书”的短篇笔记。1939年元旦遇刺之后，更加深居简出。因此，探究周作人此间思想动向的材料并不充分。

本文将以一位拿着武者小路实笃的介绍信、深得柳田国男的信赖和喜爱、在竹内好的向导下于1939年5月两次拜访周作人的日本青年在1974年的访谈为线索，边解读这篇访谈边探讨周作人当时的心境，希望能对理解这段时期的周作人有所裨益。

## 二、池上隆祐的来访及其意义

这位日本青年叫池上隆祐（1906—1986），出生于长野县（旧称“信州”）松本町（现松本市）。<sup>1</sup>他于1939年4月和5月到北京视察旅行。期间两次在当时的外务省留学生竹内好的陪同下拜访了周作人，交谈了较长时间。<sup>2</sup>5月26日去周宅辞行，周作人不在。关于拜访的事实，竹内好的日记（《竹内好全集》第15卷，筑摩书房1981.10）和周作人的日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11）都有记录。

5.15 “和池上君去北海。下午，拜访周先生。”（竹内日记）

5.15 “下午……竹内、池上来。池上赠武者画一帧<sup>3</sup>，武者赠著书一册，  
又以纸扇属书。武者小路《牟礼随笔》，寄赠。”（周作人日记）

5.16 “为池上写字四纸。”（周作人日记）

1 池上隆祐，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法学部毕业。大学时起师事柳田国男、折口信夫、武者小路实笃。1942年当选松本市市议员。战后1946年第一次国会选举年仅40岁当选为众议院议员。之后三度当选长野县教育委员。1956年就任长野县学校供餐会理事长，其信念为“供餐就是教育”。兼任信浓木崎夏期大学理事、松本交响乐团团长、信浓民俗学会会长等。（《池上隆祐遗文集》所附年谱，池上隆祐遗文集刊行会1992年版）

2 池上隆祐《柳田国男先生的回忆》，《定本 柳田国男集》第4卷月报16，筑摩书房1963年版。

3 这幅画后来成为《药堂杂文》的封面。封面是武者小路1939年3月20日所画。据周作人1963.11.9给孙旭升的信：“画上以茨姑洋芋相并放着，表示交情（日语曰‘仲’，谓中日关系）。”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0卷（钟叔河编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 5.17 “下午……以笺扇托竹内转交池上，但又忘记一册书，须再送去。”（周作人日记）
- 5.18 “带池上到海军武官室。夜，访问周先生。”（竹内日记）
- 5.18 “晚池上、竹内来。池上赠茶一罐。”（周作人日记）
- 5.26 “池上来辞行，不值。”（周作人日记）

池上具体拜访的时间是5月15日下午和5月18日晚上，他带着武者小路托带的画和新著《（牟礼随笔》，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1939.3.19）<sup>4</sup>来到八道湾。作为回礼，周作人为武者写了扇面，为池上写了四张纸，并送去一本书。<sup>5</sup>18日池上和竹内第二次拜访周作人，赠茶一罐。然后26日去往八道湾告别而不遇。两次会面日期间隔之短，双方礼尚往来之勤，可见相互都留下很好的印象。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军进驻，知识人大量南迁，周作人成为寥寥可数的几位留守北京的“一流文化人”，他对时局的态度和反应，自然成为日方密切关注的对象。就1939年而言，大型综合杂志《文艺春秋》上就有两篇周作人访问记，执笔者都是亲历事变后北京的日本文人。

一位是庆应义塾大学讲师奥野信太郎（1899—1968）。他从1936年到1938年在北京。<sup>6</sup>文中写到周作人曾专门从位于西城的八道湾到北京大学三院后的孟公府来回访自己，尽管时隔不久，奥野的文章只提及周作人谈到了永井荷风的文学，但并无具体叙述。<sup>7</sup>

《鲁迅传》的作者、1936年获得芥川奖的小田岳夫（1900—1979）则通过东亚文化协议会于1939年和三位朋友一起拜访了周作人。<sup>8</sup>小田注意到周作人优雅

4 该书收有《周作人》（《日本评论》1938.3、13卷第4号）一文。周作人获悉后于4月24日写了回信，同自己译出的武者小路的《周作人》一起以“友情的通信”为题刊登于9月16日刊《宇宙风》75期。

5 周作人的赠书估计是前一年松枝茂夫翻译的《周作人随笔集》（改造社1938年版）。

6 奥野信太郎《随笔北京》的《跋》，第一书房1940年版。

7 奥野信太郎《北京的日本学者——老北京第二话》，见《文艺春秋》的《现地报告 时局增刊》19，1939.4，p189。

的风貌中偶尔闪现的锐利之光。在小田的现地报告中，周作人批判近来报纸的无趣、对暗杀自己的犯人为何迟迟无法逮捕表示不解、并想到九州住一段时间。<sup>9</sup>

此外，虽然不是1939年，还有一篇发表在1941年6月改造社《大陆》杂志上的周作人访问记。<sup>10</sup>作者中村亮平（1887—1947）是“信州白桦派”的中心人物，深得武者小路的信赖，曾为日向“新村”成员（1919.4—1920.7），不过1919年7月周作人访问日向新村时，他不巧出村养病。<sup>11</sup>1941年当时是东京府立家政学校专任图画教员、已出版多部美术启蒙书籍的中村通过读卖新闻北支总局的介绍，拜访了周作人。在文章中介绍周作人正在研究良宽（1758—1831，江户后期的歌人、禅僧），周作人跟他说想去日本，如果去日本的话，东京呆一周就够了，想去农村安静地走走，也想去良宽的故乡看看。<sup>12</sup>

三人的文章，题目出奇地相似，可见写作姿态都是向日本国内介绍日本占领下北京的文化，其中自然极为重视的便是“一流文化人”的周作人。他们文中对周作人敬畏有加，却不够生动，相互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距离感。而池上当时的访问并没有“介绍周作人”的任务，只是抱着亲身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心情来到中国大陆。这也是周作人愿意畅所欲言的一个原因。再则虽然时隔35年，但池上很生动地描述了周作人对久米正雄的愤怒、对转向者的鄙夷、以及即便柳田国男来中国也不想见的意外态度。这些内容在1939年当时显然是不可能发表的。

---

8 对拜访周作人一事，小田在1941.3出版的『鲁迅伝』（筑摩书房）的第五章《呐喊》、晚年所写的回忆文章「人生を作る」（『新潟日報』晚报1976.6.14、6.21、6.28、7.5、7.12、7.19，收入『三笠山の月 小田嶽夫作品集』小泽书店，2000.10、p38—39）都有提及。

9 小田岳夫《新北京的支那人》，见《文艺春秋》的《现地报告 时局增刊23》1939.8、p138—139。

10 饭田吉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文献目录》（增补版），p117，汲古书院1991年版。

11 其与命运抗争、波澜奋进的生平可参看今井信雄为其所撰的长篇传记《“新村”余录——中村亮平传》，收入今井信雄的著作《〈白桦〉的周边——关于同信州教育的交流》，信教出版部1975年版。

12 中村亮平《北京的文人》，见改造社《大陆》杂志1941.6、p182。良宽出生于日本越后国出云崎，自小习四书五经及老庄哲学，18岁出家，22岁时追随来到越后的国仙和尚在备中玉岛圆通寺修行，受戒得僧名良宽。国仙和尚去世后，他便云游吉野、高野山、伊势诸国，后回乡住在山中的草庵里。良宽一生，住草庵无寺庙，行乞食，不为名利所缚，孤独清贫而落拓自在，不失对一切生物的爱，与儿童戏耍，与朋友欢谈，最不喜欢“书家的字，厨师的菜与诗人的诗”。良宽的人生态度应是周作人当时所向往的，值得进一步探讨。

这则迟到了 35 年的访问记的意义，就在于此。

### 三、池上隆祐的访谈

#### ——久米正雄、转向者（佐野学）、柳田国男与周作人

就笔者所见，池上谈及周作人的文章有如下三处：

- A 《柳田国男先生的回忆》（《定本柳田国男集》第 4 卷月报 16、1963. 4）
- B 《访谈 与柳田国男的相遇》（采访者：后藤综一郎，《季刊柳田国男研究》1974. 4）
- C 《异乡交友——与竹内好在一起的北京》（《竹内好全集》第 14 卷、月报 16，1981. 12）

其中最为详尽、生动的无疑便是 1974 年 4 月《季刊柳田国男研究》上的长篇访谈中涉及周作人的一节《周作人先生的“柳田”读法》。下面的黑体字是这一节的翻译（略去最后关于橘朴的部分）。

#### 周作人先生的“柳田”读法

我去支那时，请武者给我写了拜访周作人的介绍信。<sup>13</sup>我无论如何也想见见周作人。

周作人那儿没法马上去。周先生前一年在自己的书斋被北京大学的学生们用手枪狙击了。学生被击中而丧命。周作人逃到桌子下躲过一劫。<sup>14</sup>于是朋友们也都很担心，非常严密地警戒着。当时是外务省留学生的竹内好给我当翻译。他帮了我很多忙<sup>15</sup>，我跟竹内商量，他说有一个好的门路，我们就用了。武者先生的介绍信表面上只写“介绍池上隆祐君”，背面则写着大概如下意思的话：池上君是我的好友，我和他可以很安心地无话不谈，你也请这么做。这样你也会愉快，池上君也会愉快。但我拿出名片，周作人只看表面，感觉就礼仪性的，我就说请看一下背面。因为周作人对以前的“新村运动”怀有很多兴趣。而且由于周作人

对“白桦”文学的评价也很高，和武者互怀好意，所以武者先生和周先生两人是相互信任的。我告别时，周作人表现得有点寂寞，给我写了古诗留念。我现在还

13 1939年当时，池上已通过柳田国男与武者小路有较亲密的往来。关于池上和武者小路的关系，简单叙述如下：

池上初中时便爱读《白桦》杂志，旧制高中时一度轻蔑“白桦”派文学，但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后，二年级时（池上1925年入东大农学部，1929年再入东大法学部，不知此“二年级”指哪一次——笔者注）重读武者的小说重新感受到其魅力。之后池上家在东京成城盖房，柳田和武者小路当时也都住在成城，武者小路在柳田的介绍下拜访池上，池上为武者对人心的细微之处、以及寂寞的洞察所折服。即便武者之后搬到吉祥寺还是牟礼，都会在自己心情无法排遣时去拜访。（《访谈 与柳田国男的相遇》，《季刊柳田国男研究》1974.4）

池上与武者小路的亲密关系还和武者小路与信州（长野）的渊源有关。据池上的论文《“白桦”与信州的教育》（《文学》30（3）、1962.3，收入《池上隆祐遗文集》1992.11），在1919年月，信州是东京（44%）之外，白桦会员最多的地区（16%），尤其是在年青的教员当中。“白桦”运动在信州不是以文学运动的形式，更是以教育运动的形式呈现的。信州的教员赤羽王郎（1886—1981）被《白桦》杂志感召，去见武者小路。据本人说，第一次是1910、1911年左右，那时《白桦》杂志还刚创刊不久。赤羽王郎在信州白桦派中最早倾倒在《白桦》，被认为是“信州白桦派”的主轴，始终以最强的影响力发挥领导作用。而据竹内好1939年的日记，当时赤羽王郎在北京临时政府“内务省”任事务官，池上在北京时便住在赤羽家中。（关于赤羽王郎的北京时代，据讲谈社1988.4出版的今井雄德的《此道而往——漂泊的教师 赤羽王郎》，1939年5月赤羽当是日语学校的老师。笔者现以为竹内好的日记更可靠。此项待考）

此外，池上上旧制松本高中时便在竹内好的父亲的叔父、歌人兼柳田国男的弟子胡桃泽勘内的推荐下读了《石神问答》，第一次感受到“柳田学”的魅力。（《柳田国男先生的回忆》，前出）后与其兄喜作一起参与运营胡桃泽1929年秋在长野松本市设立的「話を聞く会」（“听话之会”）。该会持续十年，先后请了20多名各界文化名士到松本演讲，共举办了30多次。1933年11月所请的是武者小路实笃。（「話をきく会」（《听话之会》，见《池上隆祐遗文集》1992.11）当时池上应已与武者熟识。战后1946年池上参选众议院议员，武者小路还为其演讲声援，为池上的当选立下一大功劳。

总之，不管是学生时代被“白桦”文学所吸引，亦或从同乡先学那里耳濡目染到武者小路和信州教育的渊源，还是自己实际跟武者小路的接触，都可以看出池上与武者小路的深厚关系。而且，他1946年后一直参与信浓木崎夏期大学的运营，其对教育的热情和乐观理想主义，深深刻上同乡教育者赤羽王郎以及武者小路的影响。

14 关于周作人遇刺事件，据当事人范旭的证言（1990年），是由天津的一些中学生组织的“抗日杀奸团”所为，而非“北京大学的学生”。（于浩成《周作人遇刺事件真相》，见《鲁迅研究月刊》1991.9、黄开发《周作人遇刺事件始末》，见《鲁迅研究月刊》1992.8）。而且范旭说“周应声倒地”，所以并非“逃到桌子下躲过一劫”。而周作人后来则自称“觉得左腹有点疼痛，却并不跌倒”。（《知堂回想录·元旦的刺客》）当时在北京留学的竹内好当天从自己担任日语讲师的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那儿听到周作人遇刺，马上拜访尤炳轩询问事情经过。并到周作人家里去慰问，还到同仁医院去看望沈启无。（《北京日记》（1939年），见《竹内好全集》第15卷，p278）池上应当从竹内好那儿了解了周作人遇刺的事情。当时对刺客的说法众说纷纭，“北京大学的学生”说也许是1939年的一种猜测。周作人“逃到桌子下躲过一劫”的错误信息，比较难想像周作人会错误地描述给竹内好，或许是三十五年后池上记忆的偏差吧。不过，虽然对自己未经历的历史事件的记忆存在错误，但自己耳闻目睹的访谈，却是声情并茂。

保存着。话说着说着，周作人突然发出讽刺来。中国人，很辛辣呀。和日本人不一样。然后，他说我以为久米正雄这个人作家，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新闻记者。光听这句话不明白吧。我问久米怎么了，来拜访您了是吗？周作人说，是的，久米来了，然后我以为他是作家，一见面他就问我解决日中关系的关键是什么？我先不吭声地听着，周作人的眼神仿佛在说，这不是愚蠢的问题吗，若是你的话当能明白吧。过了一阵子，周作人说，我呢，回答道那要看日中双方的国民如何才能心气相合，除此之外没有吧。周作人接着说，这太讽刺了，你是为的什么研究文学。到处颠来颠去地给无聊的军部和媒体当爪牙，问的是如此无意义的、政治家似的愚蠢问题，满不在乎地跑到我这里来了。（我听了就想，——笔者注）啊，不管在本质上还是在气象上，都和日本的文学家完全不一样。特别是本质。

我听说先生在北京城外翻译希腊神话<sup>16</sup>，但先生生活的样子，给人感觉在寂静之中生气勃勃地活着。正在这时，先生问我，你最近读的日本小说中什么最有意思？我马上就回答是永井荷风的《濠东绮谭》，周先生大为赞同地十分高兴，说你果然也是这么觉得。<sup>17</sup>于是宾主间的气氛便慢慢地融洽起来。然后就把我带到书库去。一看，好多文学方面的书和范围广泛的日本研究书籍。其中满满地放着柳田先生的书。而且吃惊的是，竟然有我创办的杂志。周作人说我就是从这里

15 池上是通过竹内好的父亲的叔父胡桃泽勋内的介绍认识竹内好的。竹内好的父亲（信州人）请胡桃泽为竹内好介绍信州出身的未婚妻，因此竹内好这段时间与这位长辈经常通信。（竹内好《复员日记》1946.9.8）估计胡桃泽便在信中向竹内好介绍了自己这位即将去北京的年青同志池上隆祐。不过，1939年3月7日竹内好的父亲去世后，竹内好的动摇加剧，终于不再妥协地拒绝了这桩婚事。（竹内好《信州与旧友与我》，《潮音》47（1），1961.1）。查看竹内好1939年5月的日记，发现他与池上相见频繁。经常在一起互动的还有上面提到的同乡赤羽玉郎，可谓一种“信州人脉”形成的亲密关系。而且，即使池上回日本后，竹内还给他写信倾诉悔婚的心事。（1939.8.17日记）池上战后一直参与运营的信浓木崎夏期大学也曾请竹内好去讲课。两人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池上为《竹内好全集》的月报接受的采访鲜活地刻画出一位集自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媒体人、知中派为一身的竹内好形象。《异乡交友——与竹内好在—起的北京》（《竹内好全集》第14卷、月报16，1981年版）

16 据止庵的《周作人传》（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1938年6月7日最后一次交稿后，文化基金编译委员会迁往香港，与周作人的合作遂告中止，《希腊神话》译注工作就此停顿。（p205—206）而从1938年11月22日给松枝茂夫的信中可知，周作人这年冬天在整理希腊神话的译文，预计1939年春完成。（松枝茂夫《周作人——传记式的素描》，为松枝翻译、富山房百科学库《周作人文笔随笔抄》1940.6的“解说”。收入研文出版1999.4的《松枝茂夫文集》第二卷，p43）但1939年元旦遇刺事件之后，这一工作也再次中断。

记住你的名字的，你就是这个池上吧。我大吃一惊，十分地感动。从没想到杂志出版后数年，竟然能在异邦的学者的书斋里，看到我参与创办的杂志。<sup>18</sup>离开书库后，又谈了一会儿柳田先生。我问周作人柳田先生的书都有吗？周作人说只有一册没有。我问是什么？周作人说是《后狩词记》。<sup>19</sup>这本书我自身怎么也找不到，借来抄在笔记上。我说，先生，我作为日本人在日本找了十年也没找到，结果抄的还是抄本，先生没读到也没关系的。周作人说：哦，是吗。说着说着，周作人说听说最近柳田先生要来北京，我回说大概会来吧<sup>20</sup>，问那时候您见柳田先生吗？周作人说：不，我不准备。我问为什么，周作人说读柳田的书，感觉好像通过书本接触他比较好。我吓了一跳。周作人这个人，真的是很敏锐。不仅是周作人，中国真正的学者、评论家、思想家，和日本的文士和评论家完全不一样。他

- 17 周作人后来在写于1944年12月20日的《明治文学之追忆》（收入《立春以前》）中说：“《三田文学》……其中有永井荷风，他的随笔论文我很喜欢，虽然其大部分多是后来所作。……我对于一般小说不怎么喜欢，但如永井晚近所作的《溼东绮谭》，谷崎的《武州公秘话》，所写的方面不同，我读过都感觉有兴趣，不过他们又还写有散文随笔，那么我所喜欢的自然还是在这一边了。”比起小说，周作人一直更喜欢永井荷风的散文随笔。他当时之所以如此兴奋，也许还是出于对荷风背对时局的旁观态度的同感。（竹盛天雄《解说》，岩波文库《溼东绮谭》2016.4，81刷）关于“周作人与荷风文学”，刘岸伟在《东洋人的悲哀——周作人与日本》（河出书房新社1991.8）有专章论述，具体认为周作人喜欢《溼东绮谭》与其不似小说的随笔式的文体有关。p354。
- 18 指1930年10月池上和贺喜左卫门、中村吉次共同创办的同仁杂志《乡土》，池上为编辑兼发行人。每期都有柳田国男的投稿。不过杂志于1932年7月便休刊。最后一期为第二卷第1、2、3号达3百多页的合刊，是为纪念柳田国男1910年刊行的《石神问答》而编辑的《石》特辑号。其中请折口信夫、桥浦泰雄、胡桃泽勘内等十多名与柳田关系亲密的人或致词或画画，特别制作了两本特装本，一本池上自存，一本赠予柳田。柳田国男十分高兴，把自己保存了22年的《远野物语》的三部初稿本（采风记录、原稿、印刷的初校本）赠予了池上。池上小心保管，去世后捐给了远野市。（石井正巳《远野物语的成立过程（中）》，《东京学艺大学纪要 2部门》46 1995、p 251）笔者浏览了周作人1930年11月、12月的日记，未见购入记录。1931年日记未收入《周作人日记》（下）（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此项待查。
- 19 周作人《我的杂学》十四（1944.7，收入《苦口甘口》）中说：“以前只有一册《后狩词记》，终于没有能够搜得。”
- 20 柳田国男曾于宣告《乡土杂志》休刊的1917年，于3.24—5.29访问了台湾和中国大陆，之后20年代初作为国际联盟托管委员由日本赴欧洲的旅途中曾路过香港和上海，但都只是做短暂停留。（王京《1917年柳田国男的中国大陆之旅及其影响》，见《文化遗产》2018.2）另据王京的研究，1939年是日本民俗学的一个转折期。表现之一便是包括柳田国男本人，整个日本民俗学对中国的关心增大、杂志上与中国相关的文章增多。但到具体行动方面，不得不说柳田国男的态度还是比较保守。（王京《一九三〇、四〇年代的日本民俗学与中国》（历史民俗资料学丛书3），神奈川大学21世纪COE项目“人类文化研究的非文字资料的体系化”研究推进会议，2008.3）



们拿命在拼。此外，周作人对“转向”感到非常不可思议，而且表示轻蔑。并说日本不断地把转向者送到大陆来是什么打算，我不赞成。还说日本称蒋介石为容共派，这完全不着边际。

我觉得，日本人对中国以及中国人，需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此后我在北京的博物馆看了很多铜器，感到有点害怕。手一碰就会割到似的既严肃又端正，一点儿变形都不允许。我感到与周先生的思索态度有着共通的地方。这次中国在日本邦交正常化上就原则也一步都不退让吧。日本人对中国人所说的原则啊原理啊这些词的真正意思并不理解。日本人没有原则。表面上是一套，实际上并无法按照原则进行。不过他们中国人还是要这样（有原则地——笔者）活着，觉得不然活着也没有意义。所以周作人学习过很多意识形态的想法吧。因为他是鲁迅的弟弟。不过自有一种巍然的姿态：我不变成意识形态主义者，我还是把人当作人来尊重的人道主义者。而且，你迷迷糊糊地接触的话，一点儿也不表现于外。非常地柔和，那是中国人社交上洗练的地方。非常地殷勤、柔和。然而倘若触碰到某一线，千锤百炼的钢铁似的东西俨然贯穿着。<sup>21</sup> 总之，照字面上听来推测的话，有很多解释。也许呢，作为知日派，朋友派警卫不让他出门，所以周作人也就不外出而呆在自己的家中，觉得这个时候没有必要突破周围的保护而去见柳田先生。并非轻看柳田这个人。周作人非常看重柳田学。我见过的汤孺和（或许为“汤尔和”之误——笔者注）这个人，也非常羡慕地说日本那样的乡土研究若能在中国兴盛就好了。他说虽然希望中国早日普及这种学问，不过如你所见，这样的大陆，南北的差异就已如同异国。

我以周先生为首，见了一些中国人。我们在学校学习了东洋史等，但这些东西几乎都没有用。真的是对于中国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懂。中国人也同样不懂日本。即便是周先生那样的人，对于日本的祭礼听了日本人的说明作为知识能

---

21 池上在《异乡交友——与竹内好在一起的北京》（《竹内好全集》第14卷、月报16中也有类似的表述：“一见面，感觉非常柔和、擅长社交，但是说起话来贯穿着一根即便钢铁般的杠杆也无法撼动的筋骨，有时会发出辛辣的言论，具有成年人般的悠然之处，又让人感到厚重的坚强。”

够明白，但作为实感其实无法明白。<sup>22</sup> 如大家所知，中国这个国家，原来是无宗教的国家。有汉帝庙，祭祀着汉帝，但那不是现代人所说的宗教，而是土俗信仰，叫道教。日本和中国人有些相似，不过还是不一样。不顾这些而提倡两者的相互理解，这很难吧。柳田先生也很早就一直说，虽然日本人首先必须了解自身，但国际理解也很有必要性。我觉得柳田先生认为国际的理解最终会相当接近民族学。<sup>23</sup>

关于这篇访谈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周作人的形象，从以下三点做一下简单分析。

- (一) 周作人对久米正雄的愤怒
- (二) 周作人对转向者的鄙夷
- (三) 不想见柳田国男的周作人

22 周作人在《日本管窥四》(1937. 6. 16)中援引柳田国男的《祭礼与世间》，着眼于宗教狂热而将抬神舆壮丁的“神人和融”作为日本的宗教性格，强调中日的不同和理解日本宗教信仰的重要性。这一段非常有名。池上在1974年提到周作人对日本祭礼的言说，一个可能性是他读了1973年5月筑摩书房出版的由木山英雄翻译的周作人文集《谈日本文化书》，书中木山的译后记便分析了周作人对日本祭礼的理解和用意。另一个可能是，将《管窥》之二的衣食住和《管窥》之四的后半部合在一起的《日本之再认识》(1940. 12. 17作)收入小田岳夫自编的《大陆手帖》(竹村书房，1942. 5)和松枝茂夫翻译的《结缘豆》(实业之日本社，1944. 4)，池上也读过。

23 在了解双方的不同的基础之上，提倡“国际理解”，特别是强调了“一国民俗学”和“国际理解”密不可分的关系。池上举了汉帝庙的例子，认为这并非现代人所说的宗教，而是“土俗信仰”，是道教，日本虽然与中国有相似之处，但还是不同。池上对道教的关注也许是来自其师柳田国男的影响。

池上在《回忆柳田国男先生》(前出)中提到自己在旧制松本高中念书时，从同乡胡桃泽勘内那里借来柳田的《石神问答》，“当时对文学书籍渐感疲倦”的池上“感到一种新鲜的惊奇”，马上被这种全新的学问所吸引。在柳田民俗学初期的“三部作品”(《后狩记》、《远野物语》、《石神问答》)中，《后狩记》是调查记录，《远野物语》是笔记文学，而以真正的研究为志向的乃是《石神问答》(1910年)。根据王京的研究(《柳田国男与中国——以1920年代以前为中心》、神奈川大学《国际常民文化研究丛书4》2013. 3)，《石神问答》采用书信问答的形式，其中在柳田给东京帝大教授、日本东洋史学泰斗白鸟库吉(1865—1942)的信中，阐述了自己对日本民间信仰与中国的关系的理解。柳田认为日本民间习俗中很多以道教信仰为基础，民间诸神也很多源自道教。王京认为，从这一时期开始，柳田开始对日本民间信仰的由来和变迁产生兴趣，而他最要排除的乃是神道的说明和佛教的影响。这时，中国就成为参照，特别是对道教(阴阳教)的影响予以积极的承认。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王京还介绍柳田国男在1919年8月5日给胡桃泽勘内的信中也详细介绍了道教研究的信息。由此可以推测，以《石神问答》为契机倾心柳田国男的池上，又受同乡先学胡桃泽的影响，中国的“道教”应形成他对中国民间信仰的一个基本认识。

### （一）周作人对久米正雄的愤怒

“以为久米正雄这个人是作家，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新闻记者。”

“你是为的什么研究文学。到处颠来颠去地给无聊的军部和媒体当爪牙，问的是如此无意义的、政治家似的愚蠢问题……”

据小谷野敦的《久米正雄——微苦笑的人》（中央公論新社、2011.5）所附年谱，久米从1938年起任《东京日日新闻》的学艺部长。1938年9月作为内阁情报局派遣的“笔部队”成员，到11月视察了武汉等中国中部战场。之后，1939年3月末到1939年6月到“满洲”，采访鞍山的制铁所等。在中国的这两个月，久米也不是一直都在“满洲”。根据现在笔者看到的材料，至少5月中旬他来到了北京。5月12日在北京翠明庄参加了以他为中心、由“华北交通会社北支开发会社”资料课弘报主任，也就是宣传处的主任城所英一召集的座谈会。出席者包括久米、城所，还有文艺春秋社的特派员立上秀二、中国通村上知行等一共12名。而根据周作人1939年日记，座谈会的隔日，也就是5月13日的上午，久米和《庸报》的米川、秦二人拜访了周作人。然后只隔一日，竹内就带着池上去见周作人了。所以，周作人才会对池上提起久米来的事情，记忆才会那么清晰。而周作人当时的严厉口吻，显然给年轻的池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5月12日的“关于北京和北京人的座谈会”上，久米主要是倾听者，由长住（常驻）北京的日本人“老北京”们来漫谈北京人的气质、中国人为人处世的习惯、卢沟桥事变后北京的变化、中国人的衣食住、以及“前门的妓女”。不过从他不多的几次发言，也能感觉到其为人的轻薄。比如笑问住在北京已二十五年的中国通牛岛吉郎工作的对象是不是“中国妇人”；听说“前门妓女”现在规矩崩坏，都是“后备预备军”，便回道“但是我们去不了的话真是可惜，即便（规矩——笔者注）变好”。至于北京，久米认为氛围不像巴黎，而接近伦敦，让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城门、城墙、屋顶、砖瓦，有种颓废而又浑然一体的美，很有味道，像佛罗伦萨。<sup>24</sup> 发表于1939年7月《文艺春秋》特别号上的当地报告《满洲

信片》(一),其中三分之一篇幅在介绍大连的妓院、舞厅,而且不得不说,这一部分写得最为生动。<sup>25</sup>

一般提到久米和周作人,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久米担任日本文学报国会事务局长期间发生的“反动老作家”事件(缘起于日本作家片冈铁兵在1943年8月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上对周作人的发难)。<sup>26</sup>以及他在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结束后的10月末,为了确定下一届大会的召开地点是在“满洲”还是中国,11月中旬离开日本,在北京特意到周作人家里,恳请合作。但据牵线人、《东亚新报》的中藁英助战后的回忆,“周作人并没有立即做出答复,这次交涉不欢而散”。中藁英助回忆,久米在回来的路上毫无遮拦地喋喋不休“英雄豪杰多好色”之类的话,说“周作人也是那种青葫芦似的脸色,没有精神头儿,好像连喝酒玩儿女人的兴致也没有了”,简直像个“无赖”。<sup>27</sup>这一完全不着调的周作人印象,投射的是久米自身对欲望的轻慢,不禁让人联想到1939年5月12日座谈会上的轻薄发言。久米对周作人没有理解的耐心,也没有理解的共通项及可能性。

从池上的访谈已很清楚,周作人对久米的印象在1939年5月的那次会面已遭毁灭性破坏,因此久米四年后的努力除了导致“不欢而散”,不可能有其它结果。也许1920年代末就转向通俗小说创作、不自省地趋近新闻媒体和“国策”的久米真的不是一名周作人所理解和想象的“作家”和“文学者”。他在访问周作人后不久就在《大阪每日新闻》和《东京日日新闻》连载讴歌“日满亲善”的《白兰之歌》(1939.8.3~1940.1.9),久米在将作品作为供给他人的手段、而非自己同世界相联系的目的这一道路上越走越远。<sup>28</sup>周作人从他提出的“愚问”便看

24 《关于北京和北京人的座谈会》，出席者久米正雄、城所英一等12名。《文艺春秋》1939年8月时局增刊。

25 下一期的《文艺春秋》特别号上继续刊登了久米正雄的《满洲信片》(二)，主要谈论奉天(今沈阳)。文末表示下期还将寄稿，但未见。久米似乎未对5月13日访问周作人一事留下文字。

26 1942年5月26日日本文学报国会设立，久米是常务理事兼事务局长。1944年3月任期完了，之后继续任常任理事。

27 木山英雄《北京苦住庵记》，赵京华译，p184、185，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28 田中益三「白蘭仇花：戦時下久米正雄の一断面」，《日本文学誌要》41、1989.9、p63。

穿其浅薄虚无的本质。在池上看来，和日本的很多文笔家对时局的利用迎合相比，中国人（周作人）以命著文，有一种不枉曲自身思想信条的纯洁的强韧。<sup>29</sup>

## （二）周作人对转向者的鄙夷

“周作人对‘转向’感到非常不可思议，而且表示轻蔑。并说日本不断地把转向者送到大陆来是什么打算，我不赞成。”

周作人所说的“转向”其实是有所指的。池上和竹内好的第一次访问是5月15日，13日的周作人日记里有这么一条叙述：

上午《庸报》米川、秦二人同久米来访。……得宇田尚寄著书一册，内有佐野学文荒深甚，转向之人可丑可恶如此也。

周作人在日记里很少如此激烈批评他人。可见曾经的日本共产党最高领导人、“转向者”佐野学（1892—1953）的文章带给他的震撼很大。<sup>30</sup>

首先来了解一下赠书的宇田尚（1881—1968）。他于1938年3月到1939年9月应文部陆军两省的邀请到北京临时政府担任教育部顾问，期间1938年4月任“国立北京师范学院副院长”、8月任东亚文化协议会理事。宇田与转向国权主义的德富苏峰（1863—1957）有着共同的历史观和世界观，都主张基于皇道的国民德育。其代表著作《儒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东京东洋思想研究所，1935）的序即为德富苏峰所作，指出日本人“要以皇道来醇化、政治化、经济化、伦理化、文学化儒教的思想，开拓日本特殊的文化”。并把此书赠予狱中的日本共产党干部佐野学和锅山贞亲。此外，宇田还和检察官、警察、监狱机关相合作，

29 《异乡交友——与竹内好在一起的北京》（《竹内好全集》第14卷、月报16，1981年版）。

30 据黄开发的《关于〈沈启无自述〉》（收入黄开发《周作人研究历史与现状》，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4），周作人对曾是左翼作家的“转向者”林房雄的态度也是一样。1943年春，林房雄作为文学报国会的文化使节来北京，周作人看不起这个曾经的转向者，对他有意冷淡。

作为社会教育的一环致力于所谓“思想犯的更生”。<sup>31</sup> 因此才会有与狱中佐野学和锅山贞亲的往返书信以及面谈。

宇田赠予周作人的书是由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改造社于1939年4月出版的《对支文化工作草案》。据其《序》，这本书是宇田的“对支问题三部曲”的第一部，阐述他对对支文化工作的原理、基本问题的意见。之后准备写作的第二部是详论指导原理，第三部则涉及具体的工作方式，不过至少就改造社而言，未见后面两部。全书分六篇，其中第六篇的第一、二、三节是佐野学的信（p255—332）。周作人就是看了这部分内容，而发出转向者“可丑可恶”之言的。先看一下这三节的目录。

## 第六章 佐野学、锅山贞亲两君的对支意见批判

### 前言

#### 第一 佐野学君的私信（1938年3月18日）

关于北支新国家的指导精神及思想工作

- （一）北支新国家的建设
- （二）北支新国家的指导精神的创造和其内容
- （三）新指导精神应包含的要素
- （四）与日本北支经纶策的关系
- （五）关于大众的思想工作
- （六）关于教育
- （七）在满支日本人的思想统制的必要性
- （八）根本问题在于日本国内

#### 第二 佐野学君的私信（1938年8月5日）

31 关于宇田尚，主要参考东洋学园史料室所编的『没後50年 東洋学園創立者 宇田尚』（2017.12），以及宇田尚『对支論纂』第一集（讲演集）（东洋思想研究所，1939）。

## 第一章 关于把握支那问题的思想准备及其方法

- (一) 其必要性
- (二) 自由主义式及共产主义式的把握方法
- (三) 国民主义式的把握方法

## 第二章 关于宣传及文教政策

- (一) 比起物质利益，先给予精神
- (二) 宣传须立足于事实、道德、明确的政策
- (三) 灌输日本文化
- (四) 关于宗教政策

## 第三章 应给予支那人的政治目标

## 第四章 清朝的汉人统治政策及其灭亡的教训

- (一) 满族如何统治汉人
- (二) 汉人的复仇方法
- (三) 由以上经验应得到的教训

## 第三 佐野学君的私信（1939年1月31日）

### 关于东亚协同体的二三私见

#### 序词

#### 第一 意义及其必然根据

- (一) 协同体的三种类型
- (二) 东亚协同体应具有诸种性质
- (三) 东亚协同体必然成立的根据

#### 第二 关于东亚协同体的基础精神

- (一) 新东亚精神产出的诸条件
- (二) 关于传统的东亚精神
- (三) 关于日本精神

#### （四）新东亚精神的内容

##### 第三 关于东亚协同体的政治形态

佐野学的言论首先始终强调“北支新国家”的指导精神的中枢是皇道精神，称“新东洋精神的中心是皇道主义”。其次是“国家主义”，“新东洋精神要求国家第一”。他说：“国家的根本问题是权力，权力的作用乃是统制、命令、强制、支配、权威等。”再则，主张日本民族的优越性和日本对东洋的领导权。比如，“日本民族没有其他东洋人往往陷入的悲观主义式的彼岸主义、和消极的命运主义。日本人赞美生，始终努力致力于现世的充实。”这反过来便是对侵略战争的美化和合法化。他说日本“掌握北支的领导权”，不是不速之客的侵入，而是难以忍受社会矛盾的“北支民族”将勇武聪明的日本民族作为自己的救星招引进来。支那人有义务理解日本。“新东洋精神”要承认战争的创造性，必须对战争感到喜悦，“新东洋精神”是战斗的精神。

很明显，高举“皇道主义”和“国家主义”、“日本精神”的佐野学站在了要求超越国家疆界，联合全世界人民的“人类主义”、“博爱”的对立面。他对战争的鼓吹，也是厌恶暴力革命的周作人所不能容忍的。<sup>32</sup>

#### （三）不想见柳田国男的周作人

“周作人说听说最近柳田先生要来北京，我回说大概会来吧，问那时候您见柳田先生吗？周作人说：不，我不准备。我问为什么，周作人说读柳田的书，感觉好像通过书本接触他比较好。”

希望只通过书本接触柳田的周作人在池上来访之后，于6月19日得到两本

---

32 小川利康《日本新村对周作人之影响再议——纪念俄罗斯十月革命百周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4。当然，武者小路在战争期间的所为与他曾经的“新村”理想也存在矛盾，这是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



柳田著作的寄赠（『昔話と文学』、『木綿以前の事』）。10月3日又购入『国語の将来』，乃1939年周作人“自买”的五本外文书之一。可见对柳田的关注不减。1944年7月的《我的杂学》中周作人说：“柳田氏的学识与文章我很是钦佩，从他的许多著书里得到不少的利益与快乐。”而且之前积极参加为配合柳田国男古稀纪念而举办的一系列活动。比如出席1943年10月3日在北京创立的“东方民俗研究会”的成立大会，并准备在1944年11月的北京民俗学大会上致开幕辞（后来大会因故延期而不了了之）。<sup>33</sup>因此如池上在访谈后面强调的，周作人不见柳田“并非轻看柳田这个人。周作人非常看重柳田学”。

所以一个原因也许是池上猜测的，遇刺事件不到半年，依然深居简出的周作人觉得没有必要突破警卫去见柳田国男。

其次是柳田国男的性格问题。其实池上从1935年便因柳田国男对自己“花甲”庆祝活动的无理取闹态度，而渐渐疏远了柳田国男。<sup>34</sup>之前池上正是因自己非正式弟子的自由身份和诚实真挚的性格赢得柳田的喜爱和信任，所以柳田才会把自己保存了二十二年的《远野物语》的手稿赠予池上。但即便是这样的池上，对跟柳田长时间共处一个空间的“窒息感”深有体会，并最终无法逃脱自己主动“疏远”的结局。<sup>35</sup>因此，池上听到周作人说即便柳田来中国也不准备见时“吓了一跳。周作人这个人，真的是很敏锐”的反应，也许是对周作人洞悉柳田神经质的惊叹。

再则，从二者对民俗学的立场态度来看，对周作人与柳田国男的先行研究，一向着眼于两者的正面影响关系。<sup>36</sup>不过子安加余子在《周作人与柳田国男——各不相同的民俗学》（中央大学《人文研纪要》（69），2010）中则认为，尤其是

33 王京《一九三〇、四〇年代的日本民俗学与中国》（历史民俗资料学丛书3），神奈川大学21世纪COE项目“人类文化研究的非文字资料的体系化”研究推进会议，2008.3。

34 《访谈 与柳田国男的相遇》（采访者：后藤综一郎《季刊柳田国男研究》1974.4）。柳田国男对前来谈“花甲”庆祝活动的池上态度蛮横无理，这也许与柳田和活动发起人折口信夫当时的微妙关系、以及柳田认为现在更重要的乃是把民俗学发展成为一门真正的学问等有关。（柳田国男研究会编著《柳田国男传》，三一书房1988.11、p807）

35 《访谈 与柳田国男的相遇》（采访者：后藤综一郎，《季刊柳田国男研究》1974.4）。

进入30年代后，周作人和柳田国男的立场存在较大的隔阂。柳田在对日本民俗学理论进行体系化整理时越来越强调民俗学的实用性、民俗学的目的是为国家；而周作人接受弗雷泽之后就逐渐放弃民族主义，对民俗学本身的姿态也发生变化。子安认为30年代的周作人从柳田国男的初期作品找到自身民俗学的存在方式，而与强调“National 国民”化的柳田国男划清界限。<sup>37</sup>

周作人的“不见”，的确让所有人大出意料。1939年5月的周作人的思考，也许比我们想像的还要复杂得多。

#### 四、结语

周作人批判转向者，鄙夷充当政府军队和媒体工具的文学者，而另一方面，对跟自己一样喜欢背对时局、采取旁观态度的永井荷风的异国年轻人却深有好感；对把自己当作超越国家疆界的“新村”兄弟的武者小路亦怀抱感激之情。1939年5月当时周作人的立场其实从他对周围日本人的态度应能见出端倪，即如池上所言：周作人心中应当有“千锤百炼的钢铁似的东西俨然贯穿着”。松枝茂夫也在1955年与今村与志雄共译的《鲁迅的故家》（筑摩书房）的解说中，认为战争中的周作人“努力继续了与他自己相应的强烈抵抗”。追索日中战争时期周作人心路历程的木山英雄也理解为“虽然不是英雄式的，但作为一个始终独立的精神度过了这个困境”。<sup>38</sup>对一生住草庵、身在时伦之外而落拓自在、保持着“纯净而超然”灵魂的良宽，战时的周作人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36 赵京华《周作人与柳田国男——以固有信仰为中心的民俗学》（《日本中国学会报》1995）的基本观点便是：周作人20年代末思想发生转变，向传统文化自身的再生和复兴（而非“革命”）的道路转变，这其中与柳田国男的受容有很深的关系。再如，王兰在《周作人战前、战时的日本文化论与柳田民俗学》（《亚洲游学》164 伊藤德也编《周作人与中日文化史》，日本勉诚出版2013.5）中，虽然也提到战时柳田国男倡导从“民间传说”考察东洋的一致性，这与周作人从“祭祀”来断言中日理解的不可能形成对比，不过论文的主要方向还是在于试图从柳田同时代的文本中找出周作人日中文化理解“绝望”论的来源。

37 子安的考察的确勾勒出周作人和柳田国男的不同发展倾向，不过，关于周作人是否真正放弃“民族主义”、以及是否与柳田国男完全划清界限，还有待商榷。

38 关于松枝茂夫和木山英雄对战时周作人的理解，可见伊藤德也的概括（《周作人研究在日本》，文萍译，《鲁迅研究月刊》1993.8）。

对于这样的周作人，当时以竹内好为首的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成员是否“有一个由崇拜到唾弃的转变”呢？<sup>39</sup>在此虽然无法展开，但且不论竹内好直至1939年10月结束两年北京留学时和周作人的亲密往来<sup>40</sup>，即便是1941年1月周作人出任伪职之后的1942年春，竹内好依然和周作人保持了良好的关系。那年春天竹内好2月中旬到4月底以回教圈研究所调查的名义，到中国大陆出差。期间的2月后半和3月后半在北京，正好与当时来大陆旅游的松枝茂夫在北京相见。松枝说，周作人非常喜欢竹内好。<sup>41</sup>周作人也在当时（1942年2月1日）给松枝的信中表达了类似的意思：虽然北京和江南一样文化荒落，“但幸尚有竹内君二三旧友，可以谈话。”<sup>42</sup>因此，“唾弃”之说实在无从谈起。

周作人对竹内好来说，比起鲁迅，更是一个谜。1939年10月13日留学回国告别时周作人的“饶舌”，竹内好怀疑是將有所行动的决意<sup>43</sup>；对1941年春周作人率伪东亚文化协议会评议员代表团来日觉得“可疑”，但当亲眼看到周作人“清朗的风姿”，疑念则滑稽般地消失。<sup>44</sup>之后是1942年春的访京。然而对1939年10月告别时周作人反常的“饶舌”的疑问，竹内好一直未能消除。<sup>45</sup>

周作人在战争中的抉择，当是一个会继续被讨论下去的问题。因为如同竹内好所说，“周作人有着不逊于鲁迅的复杂性格”<sup>46</sup>，而丸山昇对此理解为周作人身

39 小林基起、商金林《日本〈中国文学〉月报中的“周氏兄弟”》，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11期。

40 《周作人日记》10.13：“下午竹内来，云即返国。以守常、独秀、尹默、平伯等人手迹赠之。又属写字，为写两纸送去。”

《竹内日记》10.13：“访问周先生。少见地精神。听了很长时间的话。……求字。还送给我李大钊和陈独秀的信筒，之后告辞。”

《竹内日记》10.14：“周先生托尤君给送来字。非常漂亮。比预想的大，两幅。给松枝一幅。此外还有鲁迅的手迹和俞平伯的。感谢至极。”

41 松枝茂夫《断断续续的回忆》，杂志《展望》1977.5的追悼号《追悼 竹内好》、p52。“周作人先生觉得那（竹内好每晚喝酒，从北京出发的计划多次因此延迟——笔者注）非常有趣，觉得很好笑。周先生自己不喝酒，但好像很喜欢看喜欢喝酒的人的醉态。在我看来，周先生非常地喜欢竹内好。”

42 小川利康、止庵编《周作人致松枝茂夫手札》，P115，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43 竹内好《评传 毛泽东》，见《中央公论》1951.4。或许竹内好这时想起中日开战后突然回国的郭沫若。

44 竹内好《佐藤春夫先生与北京》，见《文学通信》第8号1942.2。

45 竹内好《评传 毛泽东》，见《中央公论》1951.4。

上有着“与鲁迅不同形式的政治性，或者与政治无论如何也斩不断的脐带似的联结”。<sup>47</sup>这种“不同形式的政治性”的一个表现，便是在对于各种放弃原则和独立精神的日本文人（比如久米正雄、佐野学）持激烈批判的同时，心中自有一方净土，比如对良宽的向往。总之，周作人的复杂性折射在周边的人身上，只要真挚地去相对，当能得到其真实的一面，而池上隆祐这位来自异国的年青人，便是有这般魅力和幸运的人。

---

46 竹内好《从周作人到核试验》，《世界》1965.1。

47 丸山昇《战后五十年》，原载《野草》杂志57号，1996.2。可见丸山昇《鲁迅·革命·历史——丸山昇现代中国文学论集》，吴俊译，王俊文校，p39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